

臺灣抗日英雄余清芳

蔣君章

與兵抗日匡復三台

「與兵討賊復三臺，懸望旌旗得勝開，衆志流沙嘲月雪，連山喋血染塵埃；時窮節見思賢士，道遠心長失將才。嘆息忠良何處覓？風雲險惡陟崔嵬。」

「苦雨連朝實可悲，微時跨下屈男兒。招兵草澤征狼虜，仗劍蓬萊滅犬夷，鏡掩塵中光自晦，玉藏石裏價誰知？自憐跋涉千山苦，赤胆忠心輔國爲！」

「陰霾掃淨見蒼天，匡復河山賴聖賢！嘗胆臥薪甘耐苦，鋤奸抗日好爭先。晝聚軍食民迎餽，烽火彈風路不前；鏖戰沙場殲犬虜，南天振臂抗強權！」

「太息江河日下秋，問誰砥柱作中流？八千子弟同存沒，百萬生靈失自由！未決雌雄焚玉石，多疑草木化貅貅；難分勝負交鋒日，臨陣胆寒暗自憂！」

這是台灣抗日英雄余清芳在舉義抗日以後，夜宿交頸坑的感懷詩，其時爲民國四年六月三十

日，是時天降大雨，軍行艱苦，援軍未集，感事傷時，百憂叢集，發而爲詩，其慷慨悲歌的志節和救國殺敵的憤恨，雖非英雄末路之作，而今後人讀之，不禁在無限淒涼中生無限嚮往之情緒。清芳未受高深教育，但其志節，一一見之於豪邁悲壯的詩句中，有此等境遇，始有此等作品。

余清芳的抗日起義，日人稱之爲西來庵事件，西來庵者，台南市區的許多著名廟宇之一。台南人民多數來自漳泉，亦有來自福州者。他們都相信瘟疫神，而事之甚爲虔敬，此當爲副熱帶地區夏季炎熱而冗長，疫癘時生，常蔓延而成大災禍。科學不發達時代，不知這是細菌的傳染，而委之爲瘟神的肆虐。虔祀瘟神，以爲可得其歡而不致降災。台南市區祀瘟之廟有二：一個叫做白龍庵，一個便是西來庵。白龍庵在鎮北坊，祀五顯大帝，五顯大帝姓趙、鍾、雷、劉、張稱爲五帝殿，不知其原始的意義，可能出於劉、關、張、趙的桃園結義之流變；西來庵則在東安坊的府口街，也是祀奉上面的五個神，外加王、牛、史三個神像，合稱爲八部堂。所謂鎮北坊與東安

坊，乃源自鄭成功的時代。鄭成功時代，把台南市區分爲四坊，即東安坊、西定坊、寧南坊、鎮北坊，各有街二、三條，清道光年間以人口日繁，乃將每坊都分設上下坊。日人據台後，雖街道名稱，多所變更，但是台胞仍以舊日的坊街命名，不從日人之名。

西來庵在光緒初年，香火已經不盛，廟宇逐漸傾毀。有大目降人蘇有志者，爲日本台南廳的參事，兼大潭庄的區長，他和鄭利記及新化的望族多人，他們都虔信岳壇的靈異，初在家中設岳請仙，互相標榜，信者漸多。他們看到頹廢了的西來庵，亟予利用，各捐鉅款，予以修復，西來庵面貌爲之一新，蘇有志、鄭利記及其他捐資者盧乙、陳清吉等都在此聚會，設壇請仙扶乩，更有前清孝廉王藍石、庠生黃元吉等主其事，聲勢益壯。岳仙常降詩文，勸人爲善，知識分子亦多附和之。王藍石司正判文，黃元吉司抄錄，盧乙則爲正乩手，而以陳清吉爲副。每逢三、六、九日，開壇請仙，扶乩降詩，一時稱盛。他們更設食菜堂，以號召居民，吃素奉仙，於是信徒更多

，稱之為食菜教。食菜教亦稱齋教，是大陸上淵源很深的宗教，宋代已盛行於江、浙、福建等省。太平天國之役，齋教徒乘機響應，起義抗清，清政府稱之為齋匪。及起義失敗，乃向南潛伏。台南的食菜教，傳自閩南無疑，此可於食菜教徒經常往來於廈門、台灣之間的事實中，獲得證明。故西來庵之提倡齋教，可能是一種抗日運動的祕密結社。蘇有志後來辭去日方的職務，專以復興西來庵為其職責，朝夕至堂祈禱，信奉至為虔誠，蘇有志或亦有抗日起義的意志，亦未可知。日人對食菜教經常往來於台灣廈門之間，已予注意，但亦未見其可疑之處，及余清芳加入食菜教，時在堂服務，抗日起義運動，始有祕密而迅速的發展。後來余清芳起義失敗，徒眾星散，日人乃找西來庵的麻煩，株連被戮者甚多。實際上余清芳的黨徒，分布甚廣，西來庵不過是一個據點而已。日人對其他地區的余清芳黨徒，往往飄逸不定，追跡頗感困難，遂以西來庵為窮根究底的中心，甚至把這個抗日起義，稱之為西來庵事件，那是一種有計劃的摧毀西來庵和根絕台胞宗教信仰的毒計陰謀。

日本警察魚肉台胞

余清芳號清風，別號滄浪，先世為閩南人，父名蝦，母名洪好，初遷台灣時，居於阿候街，即今之屏東，遂以此為家。光緒五年十一月六日，清芳生。他的父親在台南作何生理？無法清楚，我們從他常到台南而後來遷居於台南廳的後庄鄉一點來觀察，他可能是一個小商人。清芳七歲

入私學讀書，性頗穎悟，成績甚佳，很受鄉里的稱許。但是他不幸遭到父喪，家貧，無法繼續讀書而輟學。十三歲時，曾為傭工，得微資以養母，足證此人頗有孝行。年稍長，改傭於左營庄的曾紹房，不久又在林經濟所經營的雜貨店為夥計。會日人在台南設立舊城公學，有半工半讀的辦法，余清芳乃舍去商店夥計的工作機會，入舊城公學為工讀生，學習日本語文。與同學林有信、林發等有深厚的感情，結為親密的朋友。故余清芳的幼年生活，可以說是歷盡坎坷；但其上進之心，始終不懈。其得肄業於日人設立之學校，正是他努力上進的結果。其得學日文，並進而在日本人的機關中服務，正是他抗日起義而成為台灣民族英雄的基礎。

光緒二十五年，即日本明治三十二年，時台灣淪陷於日人統治下者四年。余清芳於是年參加台南州巡查捕考試。所謂巡查捕，用現在的話來說，就是候補警員。余清芳參加是項考試的目的，是在解決職業問題？還是希望參加日本警察的工作，來了解日本警察的暴行？我們無從查證，但是清芳在日本舊城公學肄業期間，已有家國沉淪之痛，乃是事實，由此可知他的參加日本的警察考試，是一種有計劃的行動。考試結果，他錄取了，經訓練和結業試後，他取得巡查捕的資格了。就在那一年的七月，被派在阿公店支廳服務。警察本是政府官員中與民衆接觸最多的官員，所謂基層工作者，所謂親民的基層工作分子，在一般國家中，警察是民衆保姆，為民衆解除痛苦，為社會維持秩序。可是，日本在台的警察，其職

責完全相反。在平常的時候，警察是台胞的監視者。讀者諸君，一定還看到台灣還存着日本時代的日式房屋不少，其制與左右鄰居之間的牆垣，高度較大，而在面街的牆垣則減低其高度，僅及人身之半。這種房屋形式的安排，就是要減少鄰居之間的來往，而讓巡邏警察對室內居民的動靜，可以一目了然。其警察之任務是如此，其執行任務時如狼如虎的威風，予取予求的橫暴，上下其手的好惡，那真是一言難盡。視人民如草芥，視財物如蠅之逐臭，殆尚不能形容其兇暴。余清芳是血氣方剛的青年，是懷有民族思想的志士。他做阿公店支廳的巡查捕時，還只有二十歲，他親眼看到日警對我台胞的草菅人命與橫征暴斂等種種無惡不作的暴行，義憤填胸，無論怎樣也忍耐不住了。所以他常和日警意見相左，而且有時還發生衝突。他的朋友勸他無論如何要稍斂鋒芒，免啟日人猜疑。可是一個年輕人修養工夫畢竟是有其限度的，兩年多的服務期間，他不但在公務執行上常與日警持不同的意見，而且還時時流露反日的意見於友朋之間，以發洩他胸中的不平之氣。

光緒二十八年，時余清芳年二十三歲，他的阿公店支廳的巡查捕之職，被調到鳳山縣，仍任巡查捕。鳳山比阿公店，距台南州更遠，日本警察的權威，又加了一大級，魚肉台胞的橫暴，又加了一等，余清芳更是看不下去了，因而與日本警察之間，衝突的次數加多，衝突的程度加強。日警乃以余清芳為眼中釘而排斥之。余清芳竟以此等事故而被日本政府罷黜。清芳自此誓不再進

警界，而日警仍對清芳不肯罷手，時時追查其行踪，注意其職業，並下令「倘不就正業，則以無業遊民管教之。」台灣的日本官員對所謂無業遊民的管教，那是僅次於死刑的殘暴處分。清芳自遭罷黜後，本出入於五里林台南舊城等地的齋堂，志在假宗教信仰而吸收同志，以便策動抗日起義；至此，不得不謀一職業以爲掩護。光緒二十九年五月，他就書記職於關帝庄役所，所謂庄等於今日的鄉，役所等於鄉公所。這當然不是余清芳的志願。時余清芳年二十四歲。

在關帝庄役所任書記職，不過兩個月，余清芳便辭職不幹了。他在辭職之後，重返五里林庄，組織平隆會，以宣揚儒釋道三教爲宗旨，其目的當別有所在。日警對清芳監視益嚴，但清芳在表面只是循規蹈矩的作宗教宣揚，日警也對他沒有辦法。在他的傳教運動中，他認識了李德與李延綿。由於李德與李延綿的介紹，光緒三十四年，他加入了鹽水港的二十八宿會，他的社會活動的範圍擴充，影響力加大。日本警察於是下手逮捕余清芳，他們宣佈余清芳的罪狀，是行騙詐財。反正日本警察欲加之罪，何患無詞，他們可以隨便宣佈一個他們需要逮捕的人之罪，隨便找幾個人胡亂證明一下，那還算他們是在「依法辦理」，而這種被拉出來的證明，更沒有不證明的自由，尤其沒有說良心話的自由。余清芳在這樣暴政之下，在宣統元年（西元一九〇九年，明治四十二年）的年初，糊裏糊塗的被送往台東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了。時余清芳年三十歲。

余清芳在加路蘭浮浪者收容所，真是吃盡了

人間不可想像的苦頭，也許他在受到這樣的苦難中，他懂得了好漢不吃眼前虧的訣巧，循規蹈矩地過着他的地獄生活。日本人看到這個倔強的年輕人，並不像他們想像中的可怕與危險，把余清芳囚禁二年之後，便釋放了。余清芳被釋以後，暫歛鋒芒，進入了一家阿公店街的保險公司支店。阿公店街，就是現在的岡山鎮。這家店主是保正黃元，他代理着日本人辦的太平洋保險會社與日本帝國信託株式會社的招徠業務，需要有活力而能道日語的年輕人作伙伴。余清芳任這一家日本代理商的店中，擔任的職務是勸募員。其時正是宣統三年，余清芳年三十二歲。不久，黃元死了，余清芳也就離職不幹了。

神道設教加入西來庵

宣統三年就是滿清皇朝的最後一年。是年陰曆八月十九日，即陽曆十月十日，武昌的革命軍起義，當晚攻佔了武昌軍械存儲所的楚望台和督署，總督瑞澂統制（相當於現在的師長）張彪，匆忙遁走至駐泊長江的軍艦，在三數日中，光復了武漢三鎮，在一個月中光復了十多省，整個長江流域與華南各省以及黃河流域的部分省區，都入革命軍之手。滿清政府在無可奈何中起用了已被罷黜的袁世凱爲湖廣總督，與滿人兵部尚書廕昌統兵南下，妄圖規復武漢，消滅革命軍。無奈革命軍聲勢浩大，袁世凱心懷異志，南征軍事雖略佔上風，佔領了漢口與漢陽，但與革命軍隔江對峙，另派唐紹儀爲代表，假手於英國商人與上海英總領事的居間斡旋，在上海公共租界與民軍代表

伍廷芳開議和談判，一面向清政府勒索餉械，作爲緩衝與拖延時間的手段。袁世凱代表與民軍代表經過多次會議的爭辯，終於完成了議和的條件；民軍方面同意 國父孫中山先生辭去臨時大總統的職位，向參議院推荐袁世凱爲臨時大總統，袁方則發動袁系的部隊長官聯名主張共和，要求滿清政府的皇室退位。共和的統一的中華民國於是告成，這一消息傳遞到台灣，給余清芳打了一針最強烈的興奮劑，他認爲祖國革命的成功，是台灣驅逐日本的統治力量而重歸祖國懷抱的最好機會。所以他在離開阿公店街日本代理商的勸募員職務以後，他的抗日起義的雄心，又活躍起來。他的初步工作，仍然是避免日本警方的注意，創造一個職業，表示他並不是遊浪者。所以他在阿公店街設立一家販賣烟酒的小店，作爲他活動的掩護。

他對於如何推動抗日起義運動，似乎有一整套的計劃，而並不是盲動。他認爲要抗日起義，必先要有實力；要有充足的實力，必先要廣事結交；他怎樣廣事結交以充實力量呢？他的着手處，仍未忘情於宗教的運用。對於宗教與秘密組織，他曾經在五里林庄組織過平隆會，有着相當的經驗。於是他重入五里林庄，那裏也有一個西來庵，可能是與台南的西來庵聲氣揚通的，他既和五里林的西來庵發生了關係，便進一步的與台南的西來庵有了來往。其時的台南西來庵，正是蘇有志辭去了區長而農夕至食榮堂祈禱的時候。

余清芳既入台南的西來庵，很快的結識了西來庵的重要分子蘇有志和鄭利記兩紳士，而且得

到他們的信任。他更很快的與扶乩手盧乙相交好，並且暗中賄通盧乙，要他在乩上顯出神仙的指示。他要盧乙先在神案擺設一疏，向神仙請教一個問題。問題的內容，是「邇來東方山後，嘗有豪光冲霄，不知何兆？請示！」神仙對於這個問題，在乩盤上提出答案，謂「是處有寶在焉，余弟子可往取之，以除妖邪。」這個答案，無疑的是余清芳預先布置好的。答案一出，即以遍示庵中信士。於是余清芳為神仙特眷的意識，瞬息間傳遍全堂，漫漫而及於庵外的善男信女和台南附近一帶的民衆之間。余清芳由是而成爲食菜堂的信仰中心和台胞的精神領袖。大家知道余清芳到東方覓寶的往返川資都沒有，更是踴躍捐施，助成他覓寶的旅行。余清芳知道他在羣衆中已有地位，乘機揚言：天將降災於百姓，神示取寶，禱便以符籙保佑，如果每家得到一張符，便可得到平安。這個消息，傳遍了噶吧吧，台胞聞之，無不驚駭而欣慰，紛紛向余清芳求符以保平安，清芳也因此而得到很多的捐獻，作爲發展抗日起義的用途。但是，余清芳心裏非常的明白，這些奉他爲信仰中心的善男信女，並不就是推行抗日起義的羣衆；尤其在他推行抗日起義的時候，總要幾個得力的助手，他的可資爲心腹的得力助手在那裏呢？他將正式抗日起義時的拚死打活的基本羣衆又在那裏呢？他的詩中所說的「時窮節見思賢士」，所說的「問誰作砥柱作中流」，都指的是這些問題。余清芳做這些詩的時候，已經舉義而尙落敗了，所以這些詩句，也頗有懷念羅俊的意思，但亦足見他對於這些問題，一直要解決而未能

解決，或者只解決了一部分，他自己仍感到不滿意。的確，余清芳的抗日起義運動，發展的時間只有兩、三年頭，許多應該有的部署和訓練，甚至於得力幹部的結合，都還沒有照理想得到結果，而迫不及待的非舉兵抗日不可，無怪他要有詩中的那些痛苦至深的感慨了。

不過，余清芳還是有幾個重要的朋友做他的助手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江定和羅俊。這兩個人和他合作，爲禍爲福？是另一問題，我們將另作討論，但是這兩個人和他的舉義抗日有密切關係，那是沒有問題的。

舉義台中羣起響應

江定是台南應楠梓仙溪里竹頭崎庄的隘寮脚人，本是當地的望族。其人富有民族意識，且具豪俠心腸，膂力甚大，慷慨好交遊，其行徑殆爲秘密社會中人。由於他具有這種性格和社會地位，所以深爲日人所器重，被舉任區長者達二年餘之久。光緒二十五年某月，因爲鄉政的什麼問題，與鄉民張埏司發生爭執，張埏司當衆侮辱之，江定不能忍，揮掌攻之，一擊而斃。江定既是富翁，而又犯了人命官司，這正是日人魚肉的好對象。日本駐噶吧吧的憲兵隊，乃予逮捕，將治以殺人罪。江定乘日人守衛稍弛，脫獄而出，遁入山中。日本憲警搜索附近村里，無所得，疑已自殺，案遂不了了之。然江定自此即痛恨日人，誓不兩立。光緒二十六年，率其伙伴五十餘人，以後掘仔爲根據地，出沒於嘉義後大埔一帶，專門襲擊日本的警察派出所，完全採取游擊戰術，殺

了些日警以後，他們便立即撤退。光緒二十七年，日人得密報，知江定的秘密居住是在南里南庄，日人乃以警察爲中心，輔以壯丁和保甲人員，密向南庄包圍，那裏也的確有抗日義士，被擊斃者二人。日人乃使熟悉江定面貌的竹頭崎庄人張牛辨認之，張牛確定其中一人爲江定，日警乃解圍圍搜而去。實際上江定及其子江憐都不在南里南庄，而是居住在後掘仔山中，乃一天險之區，不僅形勢險要，攻入困難，而且隱蔽在叢林密菁中，即熟悉山徑的人，也很難發現。江定父子結茅爲廬，墾田自給，竹頭崎庄居民復時時資助之，不但生活寬裕，而且結草屯糧，招募志士，準備大舉，十餘年如一日。江定的舊部和平仙埔隘以及六甲等地的抗日義士，時通聲氣或樂爲江定護衛者，常逾數十人。這是一股潛伏的抗日力量，雖時向日警襲擊，但其中心人物，與外界不通聲氣，更少聯絡。余清芳知道有這一股力量，更知道有江定這一號人物，於是得林吉的介紹，在南庄與化寮的林家與江定相見，二人互道志趣與計劃，大家都有相見恨晚之感。他們遂在林家定交，江定同意只要義師一起，他定必率所部下山響應，夾攻日人，余清芳約定起義之後，余自任元帥，而請江定擔任副元帥之職。自此，余清芳得了一個志同道合的密友。江定其時的年紀，大約是四十來歲。還有一位羅俊，他的年齡比江定稍大，比余清芳更大。羅俊是嘉義他里霧庄人，生於咸豐五年，他的號是俊江。少受私塾教育，秉性聰穎，成績甚佳，故以設塾教育地方子弟爲業，對醫術也頗有心得，在地方上聲譽很高。日人因聘爲保

良局書記。羅俊既讀詩書，民族意識，自然比較的強烈。他看到炎黃裔胄，遭到了異族的統治，已經積憤難平，復見日官、日警的暴虐橫行，更是義憤填膺，所以他對這個日本爪牙性質的小吏，辭職不幹，並且參加抗日的行列。光緒二十六年，即西元一九〇〇年，明治三十三年，亦即日本據台的第五年，詹阿瑞揭發驅逐日人和恢復台灣民主國的義旗於台中，義民四起響應，山胞亦多揭竿而至，羅俊也就近參加了這次的起義運動。台中日軍，堅守不屈，義軍屢攻不能下；而各地日軍，聞訊來援，義軍便遭到內外日軍的夾攻，雖誓死奮鬥，但傷亡慘重，詹阿瑞本人亦身中流彈，仍大呼前進殺賊。詹的不幸陣亡，義軍遂敗，潰散深山，日軍雖窮追而不能殲，是役放內弄附近的村莊，遭日軍焚毀，厥狀甚慘。羅俊在這役中雖幸逃生命，但對日人懷恨益深，因密度內地，徧遊大江南北，希望能夠得到大陸的支援。羅俊此時，殆已深感以台灣一地之力，達到驅倭歸宗的目的，頗為不易，而有內台一體的意願了。他在大陸各地，到處遊歷，到處結納志士，先後達七年之久，乃化名羅璧，持中國護照來台。及歸故里，始知三子都已謝世，妻子亦以改嫁，家產且為族人所霸佔，羅俊至此，傷心欲絕。在此家破人亡的故里，又不敢久留，恐被人識破，遭不測之禍，故略事盤桓，重渡大陸，於光緒三十二年再歸祖國，以堪輿術與醫術，流寓閩南，聊資糊口，然對驅逐日人的壯志，從不稍懈。其後則歸隱於福建天柱岩寺，持齋念佛，在梵宇磐聲中，發洩其悲憤之氣。武漢首義成功，這位

隱身天柱岩寺度其老衲生活的羅俊先生，深覺祖國革命成功，富強可待，驅逐台灣的日人之壯志，又復熾盛。有陳全發者，台南人，民國三年，即日本大正三年，八月間渡海至廈門，偶與羅俊相遇，以余清芳密謀抗日起義的計劃相告，正在相機舉事。羅俊聞言，大為興奮。謀之於舊友李鏡成，鏡成亦慫恿之。其時，適有鄭龍將渡海來台，羅俊乃託其攜函賴水。賴水是羅俊的老同志，住台中廳燕務下堡的過溝莊，告以將來台圖厚利，但缺乏川資，請予接濟。賴水知其意，乃謀之於台中、嘉義、西螺一帶的同志，湊集百元，作為羅俊的盤纏，仍交鄭龍帶交羅俊。羅俊遂於是年十二月渡海來台，為避耳目，化名賴安，偕同齊友許振乾、金世鳳等男女多人，自廈門乘輪至淡水登岸，即赴台中與賴水等會合，賴水並介紹許多有關的同志相見，光是賴家的人就有四個之多。羅俊以中國革命成敗的情況，向諸同志報告，作為向大家的試探，諸志士聞之，大為感動，對台胞在日本軍國主義統治下的困苦之深，都憤恨嗟嘆不已。羅俊知衆人之心已動，乃陳其抗日起義之利，得到大家的贊成。因而形成台中方面的抗日力量。羅俊的熱朋友張重三，與余清芳的革命活動有關係；因以羅俊在台中的活動情形，告知余清芳。余清芳久知羅俊之名，但從不相識，及知其來台，渴欲相見；而羅俊之來，其動機欲與余清芳相結合，乃由張重三的介紹，特偕志士數人突赴台南的福春米廠晤余清芳。福春碾米廠乃是余清芳以邱九的名義設立的一個機關部，表面上是一個當時稱為精米所的米廠，實際上

是一個革命機關，廠在台南市府東巷，余清芳便是經常在這裏與其志士相會的。至此，這兩個抗日志士初次會晤，都恨相見之晚。羅俊密陳抗日起義的詳細計劃，清芳聽得如醉如癡，贊成不已。因相與約定各自分別聯絡同志，約期起義。於是余清芳又得到一個抗日起義的偉大的同志。羅俊向余清芳所陳的革命抗日計劃，其內容如何？世所不傳，世人且都以此次抗日起義的領袖，歸諸余清芳，羅俊之名不著；在余清芳的抗日運動中，羅俊的地位，甚至還不如江定。實際上，真正具有革命知識和領導能力的，是羅俊，不是余清芳，更不是江定。（下期續完）

蔣君章教授筆名惜秋近著三種：

戰國風雲人物第一輯 定價叁拾伍元

漢初風雲人物第二輯 定價叁拾元

臺灣歷史概要 定價四十元

郵政劃撥台北一五七八〇褚俊一戶